

总 报 告

2008年的日本：转型中的危机应对

李 薇*

摘 要：本文以日本第三次转型期为背景，对 2008 年日本经济、政治、外交、社会生活领域的核心问题进行回顾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使日本实体经济受到重创，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救助措施和刺激计划以挽救危局。日本首相再次闪电更迭，显示了“1955 年体制”崩溃后政党政治仍处在动荡之中，应对经济危机和迎合国内政治诉求，成为朝野两党争夺和维持政权的主要因素。中日首脑互访步入正轨，两国关系明显改善；面对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日本在更加强化联美抑中的同时，推进东亚及对非经济合作。而雇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区域和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加速了社会转型期的分化与重构。

关键词：日本 2008 年状况 背景分析

2008 年，日本的形势严峻。国际经济危机和国内政坛乱象、首相更迭，给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全面转型期中的这一年，涂上了更多的危机应对的悲壮色彩。本文以日本的第三次转型期为背景，对 2008 年日本经济、政治、外交、社会生活等领域发生的核心问题进行回顾与分析。

—

（一）日本经济在减速之后陷入危机

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日本实体经济受到重创，出口骤降引发经济大幅滑坡，GDP 连续呈现负增长，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2008 年，日本实际 GDP 增长速度明显下滑，四个季度环比增长率（换算为年率）分别为 3.4%、-3.5%、-2.5% 和 -14.4%。2008 财年（2008 年 4 月 1 日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实际 GDP 增长率暴跌为 -3.5%，创下战后财年经济增长率新低。上述数据公布之后，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关注，从数字上看，日本的衰退速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由此断定，日本陷入了“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

造成此次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严重依赖出口。2008 年下半年因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国际市场对日本汽车、电器以及机电设备的需求持续下降，出口相关企业的生产收入和产量相应减少。根据日本银行前总裁福井俊彦的介绍，日本的贸易依存度仅占 GDP 的 13% 左右，在发达国家中属比重较小的，但出口比重较高。在 GDP 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消费，

* 李薇，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研究专业和方向为日本法。

〔日〕内阁府《季度 GDP 速报》2009 年 5 月 20 日公布第一次速报值，后三季度与 2009 年 6 月 8 日《日本经济新闻》数据相吻合。

〔日〕《读卖新闻》2009 年 2 月 17 日援引日本经济和财政政策大臣与谢野馨语。

约 50%以上，其次是投资，再次才是贸易，但由于前两项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则相对较大。2008年第二季度之前，日本维持了长达 69 个月的低增长，2005—2007年的实质 GDP增长率分别为 1.9% 2.0% 2.4%，净出口贡献度分别为 0.3% 0.8% 1.1%，增长主要是依靠出口拉动；2008年实质 GDP增长为 -0.6%，净出口贡献度为 0.2%，增长的下降主要是因净出口下降。因此，日本出口依存度虽然较低，却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较高，这种结构在外需下降导致出口和生产减少时，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就成为了必然结果。关于第四季度出现大幅度负增长的原因，有的日本企业人士认为，除了出口急剧下降外，企业因经济预期不好而纷纷清理库存也是背景之一。关于始于 2007 年第二季度的下滑，有学者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周期性衰退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总之，无论怎样解构 2008年的经济数据，日本进入了经济危机是确定无疑的。

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危机的特征日趋明显：股市暴跌，日经 225 平均股指从 9月初的 12834 点降至 10月末的 7163 点，两个月内的跌幅为 44%，速度和幅度均为前所未有的；日元升值，12月 17日 1美元兑换 87.4 日元，创 13 年最高值；出口急剧下滑，时隔 28 年首次出现 7253 亿日元贸易赤字；企业遭受重创，一些大型制造业企业首次出现年终赤字，上市制造业企业年终合并财务报表整体出现赤字，为 2000 年以来首次；设备投资持续下降，第四季度比前期下降 16.7%，创历史最大降幅；工业企业生产指数在第四季度下降幅度为 1953 年以来最低点；占 GDP50% 以上的消费持续疲软并于第四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为 4.4%，属日本失业率高位（2002 年曾达到 5.4%）。

日本金融业虽然并没有在美国次贷上遭受直接损失，但情况并不乐观。日本的大型商业银行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强化自身体制，在 2008 年第四季度先后进行了总额约 4 万亿日元的资本增资。尽管筹资对象多为各银行关系密切的保险或证券机构，但为了吸引资金，各银行在增资的方式上仍多采用优先股或优先出资证券的方式，这对未来收益将会造成高成本负担。金融机构的 2008 财年决算结果不容乐观，含大型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主要金融机构的最终赤字额高达 4 万亿日元。造成金融机构损失扩大的原因并非直接购买美国贬值债券，而主要是缘于自身治理问题，如贷款业务的低利润竞争、因担心外资收购而回归相互持股惯用做法、对高风险证券化商品和基金的投资等。日本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为解决信用危机对大型商业银行投入了公共资金，有些商业银行在体制恢复后并没有在贷款等核心业务上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和规避道德风险，而是着手高风险高回报的业务，外资金融对日本金融业的介入带动了高管人员的薪酬，金融机构自身的体制建设尚未明显改善。

〔日〕内阁府《季度 GDP 速报》2009 年 5 月 20 日公布第一次速报值。

日本 NEC 中国公司总经理金子对笔者所言。

张季风：《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日本经济》，《亚非纵横》2009 年第 3 期。

日本财务省 2009 年 4 月 22 日贸易统计速报。

〔日〕《日本经济新闻》2009 年 2 月 7 日的数字显示，在 2008 财年，丰田公司出现 70 年来约 3500 亿日元的首次亏损，夏普为 1000 亿日元的首次亏损，半导体公司尔必达亏损约为 1179 亿日元，化工材料业的东丽公司约亏损 160 亿日元等；其他行业也出现较大亏损，如日航亏损约为 340 亿日元等。此外，另有报道说，松下电器公司约亏损 3800 亿日元，日立公司的亏损数额更高。

日本内阁府。

2008 年 12 月 1 日〔日〕《日本经济新闻》。

2009 年 4 月 24 日〔日〕《日本经济新闻》。

（二）日本政府“政策总动员”

日本这次经济危机的特点是来势迅猛，出口、消费、投资指标的下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同时发生的，特别是在第四季度表现更为明显。日本政府在 2008 年 8 月、10 月、12 月先后采取了“紧急综合对策”、“生活对策”、“紧急对策”措施，三次政策措施分别投入财政资金 1.8 万亿、4.8 万亿和 5.8 万亿日元，预期分别调动 11.5 万亿、27 万亿、37 万亿的规模的事业投资。三项政策的目标分别是，减轻高龄者的医疗费负担、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困难；向居民发放定额给付金、下调高速公路收费、创造自治体就业机会；降低就业保险费、强化住房贷款的减税、降低中小企业法人税率等。由于第四季度指标显示出经济状况已经不再是衰退，而是“恶化”，作为“经济危机对策”日本政府还将在 2009 年投入财政资金 15.4 亿日元，带动 56.8 亿日元规模的事业启动，以期使经济走出低谷，恢复增长，此为日本政府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日本 GDP 的 2%，政府预计此项计划能为 2009 财年 GDP 增长率贡献 2%。

为拯救受到重创的金融环境和实体经济，除财政政策外，日本中央银行也先后紧急推出多种危机对策，其中不乏临时性的非常规、非传统的方式。这些对策包括：为了形成超低利率环境，连续下调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 0.5% 下调至 0.3% 0.1%，基准贷款利率从 0.75% 降至 0.5% 0.3%，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供美元流动性供给且不设上限；为改善日元流动性，对短期金融市场实施大规模流动性供给，对商业银行在央行经常账户的超额部分实行临时付息（0.1%）措施；为促进企业融资，设立援助企业金融特别项目，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低息资金，通过政策性银行直接购买企业发行的 CP；为提供较长期限的资金，增加购买银行所持长期国债，2008 年 12 月购买额度从每月 1.2 增至 1.4 万亿日元；为稳定市场和金融信誉，通过直接购买商业银行持有的股票和债券，有限度地承担信用风险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就一直试图将外需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内需导向，但一直没有成功，泡沫之后更加缺少消费和投资的动力。小泉执政时期推行的结构性改革强调了市场的自由竞争，但未能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领域，导致一味依赖出口的脆弱经济特性，为了刺激出口，政府采取了压低日元汇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 年，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内需的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为此，日本政府着手修改产业再生法，通过官方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已经明确的政策措施包括：以公共资金为引导，促进社会资金向创新企业投资；民间金融机构向符合产业再生法认定标准的企业融资时，政府将为其提供一定程度的担保；在制度上允许企业将节能投资计划总额在第一年度列入折旧，减轻节能企业的税负担；创建官民共同基金机构，为复数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联手创办的创新型企业或事业项目集中投入资金支援等。

日本政府和中央银行为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刺激经济计划和应急措施虽然在 2008 年底尚未有明显效果，但可以断定至少会取得短期效果。如果美国金融危机能够见底，日本至

2009 年 4 月 11 日〔日〕《日本经济新闻》。

2009 年 4 月 11 日〔日〕《日本经济新闻》。

2009 年 2 月 24 日〔日〕《日本经济新闻》。

2009 年 4 月 23 日〔日〕《日本经济新闻》。

少在心理压力上有所缓解；如果中国经济回暖，日本的对华出口需求上升，将给 2009 年的日本经济带来曙光；仅靠日本自身内需的增长拉动增长，效果是有限的。对日本政府来说，2009 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增长，财政将为此付巨额代价。2003-2007 年间日本没有采取特殊的刺激经济对策，实行的是控制公共支出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制定了在 10 年内消减 30% 公共投资的计划，新发国债数额有所控制，但国家及地方长期债务余额对 GDP 的比仍旧保持在高位。2008 年 8 月以来，日本政府不得不暂停健全财政计划，为应对经济危机先后在 8 月、10 月、12 月连续三次动用财政采取对策，被称为“三级火箭助推”。日本已经制定了 2009 财年“经济危机对策”方案，其财政支出和国债、地方债发行力度创下历史新高。总之，在财政和金融手段余地都十分有限的状况下，依靠出口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2009 年日本经济将以走出危机为首要目标，经济刺激计划只能有短期效果，尚不能确定修改后的产业再生计划能否引导创新经济出现。

二

（一）频繁的首相更迭与不确定的政局

2008 年日本政坛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刚刚就任首相一年的福田康夫突然宣布辞职。在过去的 15 年中，日本更换了十位首相，除小泉一人独揽五年半外，其他九位首相人均任期仅一年。2007 年 9 月安倍晋三也曾在上任一年之际匆忙辞职，当人们还没有完全淡化安倍冲击时，又一位首相突然宣布辞职，日本政坛的动荡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首相的频繁更换是 1993 年“1955 年体制”解体以来日本政局动荡的延续，也是对于处在转型期的日本政治的必然现象。

2007 年 9 月临危受命的福田康夫从上台初始就意识到面临多难之途，自叹自己这届内阁“也许是一根苦命签”。2007 年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失去了以往过半的票数，导致自民党推举的福田是在众参两院对立的情况下上任的，福田称自己的内阁是“背水之阵内阁”，预感“自民党也许会失去政权”。安倍任首相时，在反恐特别法的延长、修改教育基本法、成立防卫省等问题上操之过急，而民主党高喊着通过增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口号成为了参议院第一大党；在这种局势下届任首相的福田所面临的政治局势与安倍上任时相比，于自民党更加不利。福田采取温和手段，提出了与民主党同样的健全社保的口号，并且上任伊始就

2009 年 4 月 11 日〔日〕《日本经济新闻》。

根据财务省 2008 年 10 月《财政关系诸资料》的数据，为 147.7%；根据 OECD エコノミック アウトルック [83 号 (2008 年 6 月)] 的数据，为 170.9%。

小泉内阁从 2002 年开始，每年以 2200 亿日元的额度，连续削减公共开支，2006 年出台的《关于经济财政运营和构造改革的基本方针》（“骨太方针”）又确定了未来五年内进一步削减 1.1 万亿日元的健全财政计划框架。

2009 年 4 月 11 日〔日〕《日本经济新闻》。

最近的十位日本首相任职时间：细川护熙：1993.8-1994.4 羽田孜 1994.4-1994.6 村山富市 1994.6-1996.1 桥本龙太郎 1996.1-1998.7 小渊惠三 1998.7-00.4 森喜朗 2000.4-2001.4 小泉龙一郎 2001.4-2006.9 安倍晋三 2006.9-2007.9 福田康夫 2007.9-2008.9 麻生太郎 2008.9-今。

〔日〕本田雅俊：《首相辞职的方式》PHP 新书，2008，第 280 页。

〔日〕本田雅俊：《首相辞职的方式》PHP 新书，2008，第 280 页。

试探与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合作的可能,而失去政治特色的民主党的目标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政策反对者,而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民主党利用在参议院的优势,对自民党提出的所有法案大张旗鼓地“彻底抗战”,形成众参两院相互对立的“扭曲”政治局面,福田执政的一年就是与民主党的艰苦协调中度过的。以性格温和善于协调著称的福田在其任内为一系列需要两院审议的法案费尽了周折,特别是新反恐特别措施法、道路特定财源相关的燃油税等临时税率的延长不得不采取众议院“再次批准”的方式批准通过,这是众议院 1951 年对赛艇法采取再次批准以来相隔 57 年的罕见程序。在法案进入再次批准的程序之前,日本不得不停止对印度洋美军舰艇的油料补给行动,也不得动用道路特定财源应对油价攀升。此外,在日本银行正副总裁换届的人选等需要国会批准、或其他需要向国会告知的事项上,福田内阁都处于被动立场。福田是在支持率下降和面临解散众议院的危机中决意辞职的。舆论普遍认为,福田不愿意在自己任职时因解散众议院导致自民党失去政权。正因为如此,接任首相的麻生上任后,被称为“总选举实行首相”。

2008 年 9 月麻生接任首相后,因经济日趋恶化,解散国会的问题让位于更加紧迫的经济应对,麻生打出了“政局让位于政策”的口号。由于小泽一郎秘书违法收受西村建筑公司贿赂事被曝光,小泽一郎和民主党的声誉受到影响,使得本以为更加短命的麻生内阁的支持率从最低时的 9%重新回到 30%以上。有舆论惋惜说,“自民党政权在不解散众议院的情况下还能继续维持着,早知道的话,福田也许就不会辞职了。”从过去日本的经验看,在经济处于成长阶段时期,出现萧条的时候对执政党有利,因为国民对掌握经济对策经验的自民党抱有期待;而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则对在野党有利,因为比起经济运营,国民更关心的是物价的稳定、差距的缩小、社保和环境的改善等,往往支持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批评。当经济成长阶段结束后,执政党则是在经济走出谷底并走向增长、国民恢复信心的时候比较容易获得选票;而国民如果感觉不到走出谷底并且没有信心,执政党就会丢失选票。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日本的在野党是纯粹的反对党角色,号称“凡事都反对的万年野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野党发生了变化,已经逐步具备了成为自民党竞争对手的实力,选举人对期待或者批判不再感兴趣,更看重的是结果和责任。因此,经济萧条可能使执政党失败,经济恢复可能使执政党得到支持。麻生并不具备理论水平,也经常因为读错字而受到嘲讽,但前文部大臣铃木恒夫曾经评价麻生“有执行力,善于瞄准”,有分析说,这个长处也许会让麻生选择在经济形势出现拐点的时候果断解散国会进行大选。因此,麻生内阁在 2008 年 10 月、12 月出台两个紧急经济措施后,又为 2009 年刺激经济准备了历史上数额最大的“经济危机对策”,无论于本国经济还是于自民党政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政局动荡的结构原因

日本政局的动荡源于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是处在转型期的日本政治的必然现象。1993 年之前一党独大的“55 年体制”是在占领、复兴、高增长的特定时期形成和维持的,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和低增长时期时,与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相适应的结构被打乱,过

按照日本法律,提交国会审议表决的法案在众议院审议通过而在参议院未通过时,可以在 60 天后拿回到众议院再次表决,若获得 2/3 以上赞成,法案即成立。

〔日〕盐田潮:《景气与选举的微妙关系》,《东洋经济周刊》,2008 年 11 月 29 日。

〔日〕盐田潮:《景气与选举的微妙关系》,《东洋经济周刊》,2008 年 11 月 29 日。

去不成为“问题”的事被作为问题提出，其中许多是对政治家、官僚与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反省。几十年来自民党所擅长的是党内派阀斗争，治理国家的任务基本是由训练有素的官僚主导，“1955年体制”时期的自民党与官僚之间相互配合的关系被称为“二人三条腿”。自民党本身因长期执政缺少自我反省意识，加上党内元老退出和党内的分化，力量逐渐衰弱；在野党在冷战后去意识形态化，变质、分化，从思想目标转向政权目标，而拼凑后形成的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也同样缺少党内政治共识。当国家政治经济都缺少明确方向的时候，民众更倾向于相信强势政治家个人的能力，是小泉能够执政五年半的原因。小泉以“改变自民党”、“摧毁自民党”为口号当选，面向国民、强调政策透明度、强化首相核心领导力、将政治主导变为首相主导，国家政策由官僚主导的传统格局被打乱，凸现政治家在决策中的地位。由于小泉实行的“行政改革”是政治手段，而不是政治目标，不能代表自民党的发展路线也不意味国家发展方针。日本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外需，社会所得和区域差距逐渐拉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而“自民党凭借小泉的高支持率睡了五年多的懒觉”。

随着“1955年体制”解体后政界动荡期的拉长，人们对旧结构解体的原因越来越认识清晰。战争期间，许多人疏散到农村的家乡，战争结束时又有许多人回到家乡落脚，农村是战后政治家的选票基础。随着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经济增长与人口移动，当出生在城市的新生代成为选民的时候，农村共同体的作用已经弱化，政治家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更加带给日本政党政治化时代的变化，在野党因去意识形态化而变质，在重大政治难问题上朝野变得趋同于保守。1993年以来的日本政局就是在这种朝野政治结构变化中走过的，现在的动荡是其延续。在安倍时期丢了参议院多数席位，连续两任内阁短命后，2009年将迎来日本众议院大选，处在严重经济危机中的日本，其议会政治将会出现更多不确定因素，面临更大考验。在朝野各党都缺少政治理念和自身的革新的情况下，国民投票的标准已经“不是投给优点相对更多的党，而是选择缺点相对更少的党”。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首相更迭还是政权更迭，政治取向将趋同。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因战败而严重受挫的日本国民自尊得以寄托，在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中，日本人因政治军事失败造成的失落与悲情得到缓解。但是，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经济萧条带给日本的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战后社会均衡赖以生存的基础变化。于是，企业和个人寻找自我解困的出口，各种失落和悲情激烈发酵，形成新保守主义浪潮。处在动荡时期的日本政治，必然迎合社会上的这种要求恢复自尊的悲情意识。因此，有关日本政治制度结构、政权性质、国际形象、国家利益的定位等问题将成为其国内政治的核心，日本逐渐获得“正常国家”地位的愿望将会反映在其国内政治变革中。

三

（一）2008年中日关系明显改善和发展

2001年后的五年半时间，因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小泉下台后，2006年10月安倍晋三前首相访华的“破冰之旅”、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的“融冰之旅”、2007年12月福田康夫前首相访华的“迎春之旅”，为两

本田雅俊：《首相辞职的方式》PHP新书，2008，第280页。

国关系的改善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08年 5月 6日至 10日胡锦涛主席访日的“暖春之旅”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十年后再次访日,全面推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使首脑互访步入正轨,为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打下政治基础。胡锦涛主席与福田康夫首相举行首脑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作为确定中日两国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联合声明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将被载入中日关系的史册。

在联合声明中,两国政府面向未来确认了“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重申了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构成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及 2006年 10月 8日、2007年 4月 11日《中日联合新闻公报》的各项共识。在联合声明中,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日方重申继续坚持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立场;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共同开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双方决定在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加强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和应对全球性课题等五大领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开展合作。双方同时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确定了落实联合声明的 70项具体举措。联合声明的发表明显推动了双边关系的改善。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福田康夫首相在第一时间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慰问电,并前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吊唁遇难者;日本国际救援队是最早抵达灾区的外国救援队,先后有两支救援队和医疗队参与了搜救和抢救工作,5月 24日,温家宝总理在视察灾区时特意在华西医院向日本医疗队和救援队表达了谢意;日本各界为救灾展开了捐款活动,兵库县向中国使馆赠送了阪神地震的震灾资料;“发展日中关系议员之会”的议员小组专程到四川赠送救灾物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为灾后重建制定了援助计划。日本方面在 5.12大地震后所做的一切,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感谢。

日本对北京奥运会给予了积极支持,除给与政治声援外,派出了由 576人组成的奥运代表团,为日本历史上参加奥运会人数最多的一次。8月 8日,胡锦涛在北京接见了前来参加奥运会的福田首相,代表中国政府向为北京奥运的筹办给与了真诚关心和大力支持的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表示了感谢。

2008年是《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 30周年,根据两国领导人 2007年 12月 20日在新加坡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将 2008年确定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以推动和加深两国年轻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中日双方签署了《关于“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动的备忘录》,并根据备忘录附属“关于‘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动的合作计划”,在文化、学术、环保、科技、媒体、影视、旅游等领域开展一系列两国青少年交流活动。由中国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日本外务省作为各自牵头单位承办。这是双方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3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势头的重要举措。来自日本的两千多名青少年先后分为两批到中国访问,中国的 1000多名青少年分三批访问了日本。这一活动是中日两国青年交往史上覆盖面最广、互访规模最大、安排内容最丰富的交流活动,双方领导人接见了到访的代表团。2008年 12月 20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

年”活动的倡导者——温家宝总理和福田康夫首相出席了中日双方在京联合举办的“交流年”闭幕式活动，他们评价为期一年的“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动为两国青少年创造了相互接触与交流的机会，达到了预期目的。

2008年6月18日，中日双方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协议，双方宣布在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虽然双方尚未对就具体实施方式进行磋商，但为搁置争议进行了有益的探索。7月7—9日，胡锦涛主席出席了在日本洞爷湖举行的八国集团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在与福田康夫首相的会见中，双方确定继续加强高层往来和经济对话，推进人文交流和防务交流。

2008年3月31日中日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第八次防务磋商；6月，海上自卫队“涟”号舰艇访华；7月，日本对华出口首次超过对美出口，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国；8月15日，在日本第63个战败日的当天，靖国参拜人数有所减少，媒体炒作降温。这一时期，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中日关系呈现了良好的沟通与协调，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互信，有碍中日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有所抑制。

麻生太郎于2008年9月继任日本首相后，重申了维护中日间第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的方针，两国继续保持了高层接触。与福田前首相所不同的是，麻生在表示希望继续改善日中关系时，更加强调“日中友好是手段，目标是实现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对华外交理念上，现任首相麻生不同于前任首相福田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目标更清晰地锁定在利益上，也预示着日本对华外交将进一步受到利益驱动。

（二）日美基轴前提下发展自主外交

2007年，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提出了“价值观外交”；2008年5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的国际会议上提出了加强环太平洋合作的倡议，被称为“新福田主义”；9月，麻生太郎继任首相后，提出了“自由与繁荣支弧”的理念。这些因首相更迭而出现的新提法，并不能完全看作是日本外交理念的任意变化，是日本领导人依其个人性格而做出的不同表述，有的首相善于协调，有的则过于急功近利。在这些煞费苦心别出心裁的各种表述背后，是日本领导人共同的心态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即面对变化的国际格局，特别是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日本需要树立自己在亚洲乃至全球的突出地位、显赫的存在，是联美抑中战略选择下的与政治大国身份相符的自主外交。

2008年日本在联美抑中战略的前提下，显示出对中国的重视。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影响的不断扩大，吸引日本了大量的智囊资源对中国研究和分析。日本已经认识到小泉政权一味地依傍美国的外交路线走进了死胡同，调整对华关系成为首要任务。日本FPF研究所“对华综合战略研究会”在2008年6月发表的报告中指出，“首先要明确日本自身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为此日本准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该报告认为，“日本已经不再是半个世纪前的羸弱的战败国，而是一个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有着重要作用的主体。强大并有魅力的日本，与中国建立健康的关系，对日中双方都是有益的，也会极大地促进地区的稳定。日美中关系事关亚洲地区的稳定和盛衰，影响举足轻重……为了促进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建立三国负责的框架体系，日本应率先建议举行日美中首脑会谈”。

日美同盟关系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政治资本，但是，“由于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在不断加深，中美关系今后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日本应该密切关注的。在日美中三角关系中，

日美和日中保持良好的关系，发挥互补的作用，这对日本是有利的”。可见，日本已经明确地悟出中美关系的日益接近，并“担心美中在讨论一些事关日本国家利益的问题时是否采取了‘越顶’的作法”。这些建议与前首相福田康夫提出的“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共鸣”的构想是一致的。

在联美抑中战略下，日本力图在开展多边安全对话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力求增大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和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同时规避中国外交影响的扩大对其产生的挤出效应。

2008年5月28—30日，有5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主题为“希望与机会：打造充满活力的非洲”的第四届非洲开发会议在日本横滨举行，日本充分利用该会议的召开，通过精心的筹划，扩大在非洲的影响。此外，日本利用7月7—9日在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特意安排了八国首脑同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七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举行的对话会、八国首脑同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以及主要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MEM），张显了东道主的外交能量。日本继续积极推进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努力维持与这一地区特殊的经济关系。2008年为“日本湄公河交流年”，1月在东京召开了日本—湄公河国家外长会议，通过向湄公河“东西走廊”无偿援助2000万美元加强与该地区的联系，作为战略投资对象，日本已经有8000多家企业进入该地区开展业务；4月日本与东盟签署了《日本东盟一揽子EPA》；继率先提出亚洲货币基金构想、主导推动清迈倡议（QMI）之后，2008年底，日本又为即将召开的10+3财长会议作出扩大QMI资金规模和设立事务局的建议方案，努力施展在东亚发挥主导作用的能量。2008年12月，中日韩三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福冈举行会谈，这是其他国际会议框架之外首次举行的三国领导人会议，麻生为此次会议提出了“日中韩三国联合起来扩大内需，可以在摆脱世界恐慌上领先一步”的“麻生构想”，日本将内需的概念扩大为区域性内需，充分显示出日本对日韩两国市场的需求，而这一构想与麻生此前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不无自相矛盾。虽然日本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已经获得了功能扩大化的机会，但其防务和外交仍建立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基础上，其进度、方式以及后续影响还仍受美国掌控，在排斥中国影响的同时不得不与中国联手参与东亚事务，导致日本外交呈现一定程度的矛盾性和不稳定性。

四

（一）经济危机对就业的影响

自2007年第三季度，日本企业利润开始出现下滑，到2008年第四季度，由于外需骤减，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众多相关企业出现大幅度的利润缩减，同时，由于企业工资劳务费等固定支出没有相应压缩，日本全国企业的2008年经常利润同比下降64.1%，其中制造业的收益同比下降94.3%，几乎到了“利润枯竭”状态。对就业造成压力。随着企业状况的恶化，“有

《广州日报》2008年1月14日。

2008年12月14日〔日〕《产经新闻》。

效求人倍率”为 1.07 倍，2008 年 1 月低于 1 倍，2009 年 2 月降到 0.59 倍，企业用人需求下降，求职者增加。最引人注意的是劳务派遣者的“派遣到期”，即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由于企业的大幅度减产，合同期末满被中途解约的情况也有所增加。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6 月期间，将有 19 万人因合同到期被解约，其中 13 万为劳务派遣者。

截止到 2008 年年底，就业人数与前一年相比尚没有太大变化，制造业企业尚未大幅度裁员。企业的开工率已经开始下降，减产幅度与最高开工时期相比下降了 37%，但裁员仅为 3.7%（IT 泡沫崩溃时期制造业曾经裁员 7.8%）。制造业企业之所以没有大幅度裁减员工，一方面是因外需下降来得太突然，还没有来得及应对裁员；另一方面是企业不愿意一下子把自己培养过的员工解雇。对于企业来说，解雇由技能的员工就等于企业自身的损失，而且会遇到法律纠纷，因此，不会轻易大规模解雇员工。尽管如此，第四季度中，进行小幅度裁员的企业占 35%（第三季度为 16%），在制造业中为 50%（低但季度为 20%），预计 2009 年第一季度会有所上升。目前，一部分以缩短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的方式减少解雇，但 2009 年新招员工的数量将会大幅度减少。根据日本银行预测，2009 年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将下降 3.3%，属五年来最严重状况。瑞穗综合研究所预测，2009 年出口将进一步下滑，企业收益继续下降，设备投资减少，就业、所得收入和消费与 2008 年相比会面临严峻局面，全年 GDP 增长率将比 08 年下降 6%，相应劳动投入量将下降 3.3%，为历史新高。如此高的劳动量下降不可能仅靠减少劳动时间解决，除加班时间外，正式劳动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收入的减少，涉及到劳资关系的调整和员工生活保障等诸多复杂问题。按照瑞穗综合研究所的算法，如果把人均劳动时间中的加班时间减掉，就业者人数同比减少 2.6%，失业率将从现在的 4.4% 上升到 6%。

根据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报告”，2007 年日本的雇用者人数约为 5523 万，非正式员工人数约为 1732 万，约占 1/3，而在 24 岁以下的人口中，以非正式员工身份从事工作的人数则超过 50%。1997 年至 2007 年的十年间，非正式员工的人数增加了 580 万，正式员工的人数下降了 371 万，显示出日本近十年在就业上非正式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的特点。非正式员工包括学生打工者、记时工、临时工、劳务派遣者，其中，劳务派遣者占绝大多数。根据瑞穗综合研究所的调查报告，非正式员工中，劳务派遣者大多为“非本意型”非正式员工，希望转为正式雇用，这部分人数约 570 万，约占整个雇用者人数的 10%。劳务派遣者中，大多数是家庭的生活支柱，这部分人区别于为辅助家庭收入而工作的其他非正式雇用者，他们除自己的生活外，还要养活整个家庭。在各种原因的裁员中，劳务派遣者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非正规雇用的迅速扩大开始于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的经济低迷环境中，国家为了激活企业经营活动而放宽对与劳务派遣的限制，许多企业开始将正规雇用转变为非正规雇用。非正

指在日本全国职业介绍所登记申请就业的人数对企业招工人数的比。

日本厚生劳动省：《职业安定业务统计》。

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料。

瑞穗综合研究所 2009 年 5 月调查报告。

瑞穗综合研究所根据过去实质 GDP 每工时实质雇用成本、劳动投入量（雇用者人数 X 人均劳动时间）推算 09 年 GDP 增长率下的最佳劳动投入量。

瑞穗综合研究所政策调研部主任研究员大嶋宁子。

规雇用具有灵活性和低成本受到企业的青睐,这种就业模式成为打破传统终身雇用制的最早方式。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非正式员工的这种就业不稳定性成为带给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就业情况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消费,对刺激经济计划的实施效果也会产生直接影响,2009年就业问题将是日本亟待解决的重中之重。

(二) 社会处在分化与重构之中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收入倍增计划所实现的不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倍增,同时是国民人均收入的倍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日本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出80%的国民认为自己达到了“中流”的生活水平。自此,“一亿总中流”成为后来日本社会的代名词,象征着社会的向上和稳定,日本为此傲然于国际社会。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这个超稳定的中产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崩溃、分化与重构的过程。

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开始关注贫困问题。日本既是发达国家,也是贫困大国,但是政府从来没有重视过贫困问题。长期以来,“贫困”问题在日本被遗忘,社会上习惯于回避“贫困”,只承认存在“差距”。2007年日本民间建立了反贫困网络,提醒人们注意今天的日本正直面经济高度成长以来的最大危机——贫困。有人引用评论家吉本隆明的表述,将现在的贫困称为“新贫困社会”,而三浦展的通俗社会学著作《下流社会》畅销书之后,媒体甚至有“一亿总下流”的说法。

其实,即便在大多数日本人自觉“中流”过安定小康日子的时候,社会上也存在贫困人群,但那时的日本社会由于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制度的实行,所得差距较小,个人和家庭都愿意归属于所属的集体,获得安全稳定感,经济上升期的税收为社会保险制度提供了财源,那个时候,很少关注贫困问题或者贫困的人。当“日本式社会主义”或“温和的资本主义”秩序被打乱的时候,因就业和社保而引发的个人危机感唤起了对贫困的关注,而就业和社保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归根结底还是源自于日本社会的转型。日本在赶超型经济模式失去赶超目标后,很快就经历了泡沫失败,受到美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强调了放宽规制、自我责任、充分竞争的原则,由于社会整体缺少配套的设计,当人和钱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集中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就是就业模式发生的变化,而人的流动和不稳定,使得过去以各大类组织为系统而建立的社保系统也发生了混乱,劳动力市场规则的放宽催生出数量庞大的非正式员工和他们的家属游离了既有的社保系统。竞争打破了原来的各种均衡,政府有限的财源不得不限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区域差距和人之间的差距拉大,分化和重构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8年的《蟹工船》现象足以引起人们对日本社会更多的思考。作家小林多喜二发表于1929年的这本小说,在2007年以漫画的形式被推出后,小说本身也于2008年意外地成为抢手的畅销书,伴随着不断的增印、电视台的特别报道节目、电视纪录片、阅读征文活动、电影和话剧的制作等,《蟹工船》火爆了整个日本。一位几乎被淡忘了80年的无产阶级作家和他的一本小说再次受到追捧,其背后同是对现实社会不满、失望、揭露的同质,以及困于经济危机的时代巧合。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日趋保守的政治,都是人们借用《蟹工船》发出呼唤、醒世的背景。如果2008年的日本其社会的很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对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和国家专制统治的1929年小说感同身受,足以证明20世纪80年代的中流安定社会在经历了90年代“失去的十年”后已经不复存在,日本社会确实处在—

个转型中的动荡期。

社会的变化还可以从家庭关系中得以证实。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有效劳动力的减少、投资减少和社会保障成本的加大，老龄化问题是困惑今后日本社保的一大难题。但是也有调查表明，在老龄化的过程中，日本老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并不全部被老年人用于养老和医疗，而是以多种方式被用于海外投资，由于投资收益的增加，以及日本家庭文化背景发生的变化，成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家庭转移方向发生了改变，老年人对成年孩子的依靠在下降，而在很多家庭中，老年人向成年的孩子提供着资金。这项调查表明目前的老年一代并没有因为老龄化给社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而是反过来为社会作贡献，同时也更加证实了“啃老族”、“飞特族”(自由职业者)的存在。从年轻一代对老人的赡养到双方各自养活自己、再到依靠老人接济，即便目前还不是普遍现象，但日本的家庭关系随着社会变革正在出现新的形态这一点事值得关注的。

综上所述，2008年和2009年的日本已经或必将在应对政治经济危机中度过。回顾2008年的日本并追踪2009年的日本时，我们要在日本自身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内因结构上寻找线索和答案。

参考文献

〔日〕内阁府：《季度GDP速报》，2009年4月。

〔日〕财务省2009年4月贸易统计速报。

2009年4月24日〔日〕《日本经济新闻》。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2008年相关报道。

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index.html/>，2008年相关报道。

原文刊载于《2009年日本发展报告》